

田中内阁“扶蒋反共”政策与 蒋日合作（1927—1928）^{*}

王 美 平

摘 要：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日本田中义一内阁基于日俄在华竞争关系、“反共”意识形态以及维护东亚殖民统治等考量，针对国民革命推行了“弃汉扶宁”、“南北妥协”、“促蒋讨共”等政策，成为列强在东亚推行“反共”政策的急先锋，构成武汉国民政府实施“分共”政策的重要外因。“扶蒋反共”与“分离满蒙”是东方会议出台“分治中国”战略的“一体两翼”，其实质是以长城、长江为界分割中国，维护日本在东北、华北乃至长江流域的特权。故日本与蒋介石在长江以南基于“反共”目的进行了合作，但蒋介石一旦越江北上，日本便采取“扶张反蒋”政策。蒋日合作最终走向破裂，但“反共”成为此后日本对华政策的基调，并贯穿于 14 年侵华战争之始终。

关键词：北伐 田中义一 蒋介石 东方会议 中日关系

日本的对华政策对国民革命的进程与结果产生了重大影响。学界就日本相关政策的研究基本分属两系。其一，关注田中义一内阁（1927 年 4 月至 1929 年 7 月）通过东方会议出台的“分离满蒙”政策及其附属问题，重视日本对华政策中的“扶张反蒋”、阻挠北伐面相。^①其二，关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一战后日本的‘转向’与对外战略误判研究”（17JJD770010）的阶段性成果并得到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资助，曾提交《历史研究》编辑部与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共同主办的第六届青年史学家论坛。

① 中国的代表成果有沈予：《日本东方会议和田中义一内阁对华政策——评〈田中奏折〉伪造说》（《近代史研究》1981 年第 1 期）、《关于〈田中奏折〉若干问题的再探讨》（《历史研究》1995 年第 2 期）；俞辛焞：《近代日本外交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 年；臧运祜：《中日关于济案的交涉及其“解决”》，《历史研究》2004 年第 1 期；邵建国：《北伐战争时期的中日关系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 年；祝曙光：《徘徊在新、旧外交之间——20 世纪 20 年代日本外交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年；易丙兰：《奉系与东北铁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年；郭循春：《“北伐”期间田中内阁对“满蒙”政策的一面》，《民国档案》2017 年第 1 期。日本的代表成果有臼井勝美：《田中外交についての覚書》，《國際政治》1960 年第 11 号；芳賀秀明：《田中外交の一局面：張・山本協約について》，《法政史学》1964 年第 16 号；馬場明：《第一次山東出兵と田中外交》，《アジア研究》1963 年第 3 号；稻生典太郎：《“田中上奏文”をめぐる二三の問題》，《國際政治》1964 年第 26 号；入江昭：《極東新秩序の模索》，東京：原書房，1968 年；佐藤元英：《昭和初期对中国政策の研究》，東京：原書房，1992 年。

注币原外交与列强一道分化国民革命，怂恿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重视日本“与蒋合作”的面相。^①这种人为分解日本对华政策的研究方式，使人难以理解日本何以忽而“扶蒋”忽而“反蒋”。现有研究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至1927年蒋介石与田中义一会谈前日本对国共两党的政策关注不足，只是在探讨蒋介石走上联日“反共”道路的整体脉络与“蒋·田中会谈”时有所触及，并未详加论述。^②该时期恰是理解日本对华政策为何在“扶蒋”与“反蒋”之间游离的关键。尽管有个别学者关注到日本政府“拉蒋反共”与“分离满蒙”之间的关系，但主张田中内阁的“反共”是为拉拢蒋介石、实现“分离满蒙”的一面旗帜，判断田中支持蒋介石在张作霖退守东北后的北上统一。^③日本“反共”究竟是否仅是一时的权宜之计？田中拉拢蒋介石究竟是否只是为了“分离满蒙”？日本政府是否支持蒋介石统一华北？这些都是值得商榷的问题。本文拟综合利用中、日、英文档案文献，梳理田中内阁推行“扶蒋反共”政策的内容及原因，分析该政策与“分离满蒙”之间的关系，阐释北伐期间田中内阁的整体对华战略，以便全盘考虑田中内阁对国民革命的观察与政策，揭示其对华政策的全貌及其内在逻辑。

一、田中义一内阁“反共”方针的初建

日本宪政会内阁对于国民政府第一次北伐的政策，以1927年3月24日爆发的南京事件为界，在军部的推动与币原喜重郎外相的主导之下，发生了从“不干涉”到“出兵压迫”并“逼蒋反共”的转变。^④尽管如此，币原外交还是遭到日本国内的强烈批判，引发各界的倒阁运动。其中作为最大在野党的政友会出力尤甚。

政友会于原敬总裁逝世后，在纯粹的政党政治路线与非选出的专制势力妥协路线中摇摆不定。1925年，政友会为赢得选举，迎入军界大老田中义一大将担任第五代总裁。1927年2月，随着国民革命军迅速发展至长江流域，田中义一授意党内地位仅次于党首的干事长山本条太郎，携森恪、松冈洋右等要员考察中国。山本一行在华逗留35天，重点考察了长江流域，会见了国民政府最高顾问鲍罗廷、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外交部长陈友仁等政要。回国后，山本就中国形势呈交了三份报告，提出国民革命“苏俄控制说”，认为国民革命是所谓的“赤化”运动。在思想上，山本认为国民党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列入三民主义，其思想信仰本身已经“共产化”。^⑤在政治上，山本得出国民党受苏联操控的结论。^⑥他认识到国民政府由国民党掌控，只是国民党的决议执行机关，由鲍罗廷担任最高顾问，另有二三百名苏联顾问掌

① 沈予：《“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与帝国主义关系再探讨》，《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杨天石、牛大勇等：《中华民国史》第2编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344—357页；黄自进：《蒋介石与日本》，台北：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第88—105页；王美平：《日本政府对一次北伐的观察与反应》，《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9年第2期。

② 沈予：《国民革命与日蒋关系》，《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2期；郎维成：《1927年蒋介石与田中义一会谈的内容及后果》，《东北师大学报》1988年第5期；周颂伦：《1927年蒋介石与田中义一密约述实》，《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

③ 加藤聖文：《北伐と日中反共提携構想：田中義一・蒋介石会談をめぐる考察》，黄自進、劉建輝、戸部良一編：《〈日中戦争〉とは何だったのか》，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17年，第12、23頁。

④ 参见王美平：《日本政府对一次北伐的观察与反应》，《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9年第2期。

⑤ 山本条太郎翁伝記編纂会编：《山本条太郎論策》（2），東京：山本条太郎翁伝記編纂会，1939年，第551頁。

⑥ 山本条太郎：《動亂の支那を視察して》，《政友》第325号，1928年1月，第9、15頁。

握枢要。^① 森恪则指出鲍罗廷明确承认苏联向国民党提供武器与军费，认为国民政府尤其是政治教育由鲍罗廷指挥，其后台为苏联政府。^② 政友会在第 52 次帝国议会的报告中将国民政府的机构视若“苏维埃政府的一个分支”。^③ 在组织上，山本认为国民政府从苏联获得的最有力援助，并非武器与资金，而是“在鲍罗廷的指挥与鼓动下，由蒋介石亲赴俄都学习、训练、移植而成的俄式细胞组织及其运用”。他认为位于上海的中国共产党本部，也完全是第三国际的“翻版”，接受苏联驻沪总领事的指挥，重要事项则由莫斯科驻华临时委员加拉罕下达命令。山本分析总工会与农会是细胞组织，总工会统辖 400 多个工会，晚 9 点下达命令，翌晨 6 点便能实行总罢工，对日侨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威胁”。在军事上，山本认为国民革命军虽被信奉三民主义、反对共产党的蒋介石掌控，但其下属多是出身于军官学校的青年士官，他们容易接受共产主义思想，且与北方军阀一手掌控文武大权不同，国民革命军的军人只有军事统帅权，各师、团、营、连、排都设置一名属于“左倾分子”的党代表，在大部队中还设有苏联派出的参谋，故国民政府的军事实际上亦深受共产党的影响。在对外关系上，山本认为国民政府采取亲苏政策，并“离间”日英，中国的反英运动是苏联煽动所致。若国民革命军统一中国，恐将在政治、军事部门全部使用苏联顾问，届时中国将被苏联控制。在前途上，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山本认为即便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国民党能够暂时“封禁”共产党，但不可能“永远铲除共产党”。共产党已有相当基础，且有苏联支持。不论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斗争如何发展，强大的“混乱分子”已被移植于中国则是确凿的事实。^④ 总之，山本认为国民革命是“北方军阀与劳农俄国的战争”，即北方军阀与共产主义运动之争，同时也是苏联争夺日本在华“地盘”与权益的斗争，要求日本政府积极干涉。

山本的上述论调被田中义一接受，成为其制定对华政策的认识基础。4 月 16 日，田中义一在政友会临时大会的演说中将南京事件、汉口事件视为对日本尊严的“践踏”，是对日本在华官民的“凌辱”，损害了日本国威，评价国民革命是“赤化”运动，批判宪政会内阁的“不干涉”政策不仅危及日本侨民与日本在华权益，而且“放任”共产主义运动扩散至“接壤地区”，极不利于日本的“自卫”，并认为中国的变局已超出单纯的内争范围，是“有恐影响东亚安全、累及世界和平”的国际事件，要求日本出于“自卫”及保护在华权益的目的，在与列强协调的同时改变不干涉政策。^⑤ 19 日，田中义一打倒若槻礼次郎内阁，经元老西园寺公望奏荐受命组建新内阁。^⑥ 22 日，田中完成组阁，由其本人兼任外相，并向国内外发表组阁声明，其中就中国时局表达了不会任由共产主义发展的方针。即：“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我国有可能直接受到影响，日本对于维持东亚政体的稳定具有重大责任，故对此无法漠不关心，更何况其活动将影响世界和平与人类福祉，事关重大。故，我等当根据具体问题及其手段适时地与列强协调应对。”^⑦ 由此，田中首相推出了纠集列强共同“反共”的对华方针。日本军方则早在南京事件爆发不久

① 山本条太郎翁伝記編纂会编：《山本条太郎論策》（2），第 509、531 頁。

② 山浦貫一編：《森恪》（下），東京：高山書院，1943 年，第 538 頁。

③ 《第五十二回帝国議會報告書》，《政友》第 317 号，1927 年 7 月，第 13 頁。

④ 山本条太郎翁伝記編纂会编：《山本条太郎論策》（2），第 507—508、556、509—510、515、526—527、512 頁。

⑤ 高倉徹一編：《田中義一伝記》（下），東京：原書房，1981 年，第 547—548 頁。

⑥ 参见邵建国：《北伐战争时期的中日关系研究》，第 24 页。

⑦ 高倉徹一編：《田中義一伝記》（下），第 570 頁。

便要求联合列强围堵共产党。^①

田中内阁针对国民革命之所以推出“反共”方针,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首先,近代以来日俄两大帝国主义围绕中国的激烈竞争关系,使日本极度担忧苏联通过援助中国革命借机挤压日本在华权益。日本自幕末开始戒备俄国的南下扩张,^②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于1880年上奏《邻邦兵备略》,以俄国为首敌,要求扩建海军。^③甲午战后,俄国联合法、德进行“三国干涉”,迫使日本归还辽东,同时与清政府签订《中俄密约》,加紧修建西伯利亚铁路,并在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租借旅顺、大连。日本为对外扩张,进行专门针对俄国的扩军备战,于1904年对俄发动帝国主义争夺战,通过军事胜利攫取“南满权益”。此后日本仍将俄国视为第一假想敌,与之在中国东北及内蒙古地区展开激烈竞争。俄国十月革命后,日本对苏联实力的评估有所下降,但在1923年修订的《帝国国防方针》中依然将苏联视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假想敌。^④日苏虽于1924年开启谈判并于翌年建交,但因日方在华支持奉张,苏联既与孙中山合作,又支持冯玉祥反奉。在此背景下,中国相继爆发郭松龄倒戈事件、冯奉战争、北伐等重大事件。上述事件的最终矛头均指向日本为维护、扩大“满蒙权益”所倚重、扶植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日本出兵干涉郭松龄倒戈事件,^⑤致使与冯玉祥暗中联络的郭松龄转胜为败。继之,冯玉祥在与张作霖的作战中失败,出亡苏联,转战西北。此后,苏联顾问鲍罗廷、加仑等人支持国民革命军北伐,并推动中国进行“革命外交”,收回英国等西方列强基于不平等条约攫取的在华权益。随着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汉,日本军部怂恿张作霖“和冯(玉祥)助孙(传芳)”,^⑥张作霖于12月纠合北方军阀建立安国军,对抗苏联支持下的国民革命。

其次,这是由日本固有的“反共”意识形态决定的。共产主义思想是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确立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与“绝对天皇制”国体的“天敌”。在国民革命之前,日本便担忧共产主义思想及苏联推行“世界革命”影响其安全与稳定,在国内外实施了一系列“反共”政策。日本政府早于1910年解散社会主义团体平民社,1911年以策划暗杀明治天皇为罪名,制造“大逆事件”,处死以幸德秋水为首的24名社会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俄国十月革命后,原敬内阁为防范共产主义的扩散,在对外政策上联合美、英围堵、扼杀俄国革命,在1918—1922年间出兵西伯利亚。田中义一恰是当时执意推行该政策的陆军大臣,并对深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的朝鲜“三一运动”与中国五四运动,均采取敌视态度。^⑦1923年,军部在修订国防方针时对十月革命后苏联确立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政治体制保持高度警惕。^⑧1925年,日本政府制定《治安维持法》,控制工人运动,打压主张主权在民、反对绝对天皇制的日本共产党。田中组阁后,在日本国内加紧推行“反共”政策,先后制造“三一五事件”与“四一六事件”,逮捕两千余名日本共产党员,解散左翼政党。^⑨

① 《南京事件に関する五国政府の国民政府に対する抗議について》(1927年4月11日),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1927年),東京:外務省,1989年,第577—580頁。

② 林子平:《海国兵談・自序》,東京:図南社,1916年,第5頁。

③ 防衛庁防衛研究所戦史部:《陸軍軍戦備》,東京:朝雲新聞社,1979年,第20頁。

④ 《帝国国防方針》(1923年),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4061002700。

⑤ 参见沈予:《日本大陆政策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75—277页。

⑥ 角田順校:《宇垣一成日記》(1),東京:みすず書房,1968年,第555頁。

⑦ William F. Morton, *Tanaka Giichi and Japan's China Polic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0, pp. 33-45.

⑧ 《帝国国防方針》(1923年),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4061002700。

⑨ 塩田庄兵衛:《日本労働運動の歴史》,東京:労働旬報社,1964年,第98頁。

再次，维护日本在朝鲜、中国的台湾与东北等地建立起的殖民统治秩序与权益，是田中对华推行“反共”方针的根本目的。明治维新后，日本将西方殖民者推行的侵略政策与帝国主义认作“国际通则”，加以效仿，通过实施“脱亚入欧”、侵略亚洲的方式，将中国台湾、朝鲜纳入其殖民统治范围。日本通过日俄战争攫取“南满权益”后，维护、扩大所谓的“满蒙特殊权益”成为其对华政策的重心。为此，日本推出“二十一条”、扶植亲日的北洋军阀。然而，国民革命反对帝国主义，要求收回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的各项特权。日本担忧北伐一旦波及东北，不仅动摇其“满蒙权益”，而且将影响其在朝鲜与中国台湾的统治，颠覆其在东亚范围内的殖民统治。尤其是对在日俄战后亲手起草日本攻势国防方针的田中义一而言，^①“满蒙”不仅是日本通过战争获取的战利品，而且是日本于一战后推行“总体战”战略所必需的资源供给地、劳力来源地和日本过剩人口的输出地，是必须“死守”的“国防安全线”与“经济生命线”。而与苏联接壤的地理位置，致使田中对共产主义在东北的扩散尤为警觉。田中正是为推行其“总体战”战略的夙愿，放弃成为军界元帅的机会与现役大将的身份，接受政友会总裁之职。^②故而，通过“扶蒋反共”政策，分化、瓦解国民革命，遏制国民革命军北上，便成为田中内阁维护其“满蒙权益”的重要途径。

日本对国民革命推行“反共”方针，同时也是为巩固其在长江流域与华北地区的利权。甲午战后，日本势力渗入长江流域。义和团运动后，日本在天津设置中国驻屯军司令部，获得了在华北扩张的据点。一战期间，日本占领青岛、胶济铁路，设立青岛守备军与民政署，对青岛进行了长达八年的殖民统治。华盛顿会议后，日本迫于外力虽将青岛、胶济铁路归还中国，但其在山东已建立起势力范围。1927年，内外棉、大康、东洋等纺织公司在青岛、天津、上海、汉口的直接投资总额近1亿日元，债权投资达4.97亿日元。^③以日清汽船为代表的航运业，在上海、汉口为中心的长江流域已颇具竞争力。1927年，日本在长江中下游的载货量仅次于英国，而在长江上游则超越英国。^④此外，日本还在长江部署第一遣外舰队，武力保护其商业利益，^⑤并在汉冶萍煤铁矿、南浔铁道、桃冲铁矿等具有军事价值的部门攫取了特权。扩大在整个中国的权益，正是币原外交的重要目标。田中虽比币原更重视东北利权，但亦不能完全忽视在华北、长江沿线发展的日本商民的呼声。

总之，田中内阁基于对外扩张中的对俄竞争关系、“反共”的意识形态，并为维护日本在东亚的殖民统治，在上台伊始便初步确立了“反共”方针。

二、“弃汉扶宁”政策与武汉国民政府的应对

田中内阁因南京事件而成功上台，解决宁案成为其面临的重要任务。其时，国民政府已分

① 北岡伸一：《日本陸軍と大陸政策》，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8年，第9頁。

② 繆繼厚：《田中義一：日本总体战体制的始作俑者》，顾令仪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97—350页。

③ 大蔵省理財局国庫科：《在支邦人紡績業投資額調》（1927年4月15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A08072541000。

④ 汉口至宜昌线日本份额为58.5%，英国为34.8%；宜昌至重庆线，日本为14.1%，英国为1.7%；上海至汉口线日本为38.7%，英国为50.6%；汉口至湘潭线，日本为40.6%，英国为53.5%。（浅居誠一編：《日清汽船株式会社三十年史及追補》，東京：日清汽船株式会社，1941年，第95頁）

⑤ 李少军：《国民革命前日本海军在长江流域的扩张》，《历史研究》2014年第1期。

裂为武汉、南京两个政府。在英、日、美等列强大兵压境、可能武力干涉革命的背景下，列强与何者展开谈判，关系到两个新生政权的国际正当性乃至生存问题。

南京事件爆发后，蒋介石等右派在宁沪地区暗中策划“分共”事宜，与武汉政府日渐背离。时任外相的币原喜重郎基于“南京事件系为共产党所为”、蒋介石属于“稳健派”的判断，为实现促使蒋介石“分共”的目的，起初与列强一道就谈判对象采取了以武汉政府为主，以蒋介石为辅的方针，并策应蒋介石武力压迫武汉政府，同时致力于劝诱列强切勿向国民政府发出最后通牒，以致形成最终不得不对革命军动武而无成效的尴尬境地。^① 英国通过驻日大使蒂雷（John Tilley）对日本诱导蒋介石实施“分共逐俄”政策亦有把握，^② 并接受日本关于国民政府已发生左右分化、可促使蒋介石进攻共产党的观点，采纳了日本放弃提出最后通牒的建议。^③ 故而，日、英、美、法、意五国公使经过一系列商讨，于4月11日向武汉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递交了抗议性的共同通牒，要求惩处中国肇事“军队长官及有关人员”、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书面道歉并“担保以后绝无妨碍外人生命财产之暴动及风潮”、对受害之外国人进行“完全赔偿”。^④ 4月14日，陈友仁向驻汉口的五国领事分别提交了答复，认为“惩罚”与“道歉”都应在查明南京事件系为革命军所为之基础上，亦应基于国际法调查英、美海军炮击南京一案以及1925年的五卅惨案与沙基惨案、1926年之英国炮轰万县事件，并认为只有废除不平等条约才能切实保障外人生命财产安全。^⑤ 五国公使团于4月15日在北京召开会议，认为陈友仁的回答充满“狡辩”，由此难以进入具体交涉，决定各自电请本国授权同意五国公使发出第二次共同通牒。^⑥

正当列强之间就是否采取武力制裁手段、是否发出第二次共同通牒进行协商之际，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政府。次日，日本内阁更迭，田中义一领导的政友会内阁上台。田中内阁认为苏联顾问与共产党对武汉政府施加了较大影响，因而对武汉政府采取敌视态度，希望蒋介石在宁汉对峙中获胜。5月18日，日本外务省收到汉口江汉高级中学总务长斋藤重保之报告，认为只要以共产党为中心的武汉政府及总工会存在，日侨就难以在当地安身立命，恢复工商利益，故其要求日本政府改变不干涉政策，“彻底根绝共产派，扫荡匪徒”。^⑦ 当日，田中义一作为外务大臣在天皇的最高咨询机关枢密院会议上，就中国问题明确表达了支持蒋介石、反对共产党的态度。他在报告中将宁沪一带的紧张局势归咎于共产党，判断蒋介石“将推行以中国为本的革命，而绝不会推行共产主义”，肯定南京政府是由国民党右派齐集于蒋介石麾下所建，采取

① 参见王美平：《日本政府对一次北伐的观察与反应》，《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9年第2期。

② “Sir J. Tilley to Sir Austen Chamberlain,” April 7, 1927, in Kenneth Bourne and D. Cameron Watt, eds.,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series E, Asia vol. 32, 1914-1939, Frederick, MD: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pp. 346-347.

③ 王蓉霞：《英国和日本在中国（1925—1931年）》，博士学位论文，首都师范大学，2001年，第101页。

④ 《南京事件に関する五国政府の国民政府に対する抗議について》（1927年4月11日），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1927年），第575—576頁；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14辑，台北：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78年，第607—608頁。

⑤ 《外交部长陈友仁上中央政治会议呈》（1927年4月14日），台北“国史馆”藏，汉13825；Text of Mr. Chen's reply to the Japanese Consul-General, Hankow, April 14, 1927，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1927年），第590—593頁。

⑥ 芳沢謙吉より幣原喜重郎宛第434号電：《武漢政府の回答に関する五国会議の議事について》（1927年4月15日），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1927年），第594—595頁。

⑦ 東亜同文会より木村鋭市宛第72号電：《漢口最近の状況》（1927年5月18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2031858000。

“扑杀共产党”的政策，致使“共产党现在几近灭绝”。另一方面，田中认为武汉的“军权中心”唐生智也与武汉政府渐呈“离散之势”，评价武汉方面为壮大声势而“狂热”地“煽动”工人、农民，导致汉口外国租界中仅存个别日本人，其他国家均已撤离，工人失业，农民渐陷困窘。田中明确表示“日本当然希望比较稳健的蒋介石能够打倒共产党，并愿在精神上给予同情”。^①

在南京事件的解决上，田中内阁认为武汉政府并无解决问题的“诚意与能力”，并出于维护日本在长江流域商贸利益的目的，反对英国坚持的以武汉政府为交涉对象、以武力作为最终手段的解决方案，而是希望列强在向武汉发出第二次共同通牒后改与蒋介石谈判。4月20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鉴于南京政府的成立，认为武汉政府对于南京的军队已不具实权，即便与之交涉，武汉政府也无法惩办革命军肇事人员，故召集英、美、法、意四国公使就此进行商讨。列强公使的意见分为两派，英国并不信任、重视蒋介石，^②主张应继续与武汉政府展开交涉。另一派则认为应与蒋介石谈判，但尚需等待时机。4月21日，芳泽电请田中义一加紧同意五国公使向武汉政府提出第二次共同通牒。^③同日，美国政府却表示不拟参加第二次共同通牒，且电令驻华公使马慕瑞（John MacMurray）可单独同武汉政府展开交涉。^④此后，田中义一先后于4月23、27日和5月1日三令驻美大使敦促美国参加五国共同通牒，维持列强协调体制，但遭到美国的拒绝。美国认为第二次共同通牒若以蒋介石为对象，则有可能促使“稳健”的蒋介石也采取过激措施；若以武汉政府为对象，则该通牒若较第一次通牒更为软弱，有恐引起武汉政府的轻视，若更为强硬，则有恐引起武力制裁问题。^⑤在美国拒绝参加的情况下，田中为维持列强协调体制也放弃向武汉发出第二次共同通牒，但主张与蒋介石领导的南京政府谈判。5月3日，田中向英国驻日大使建议：鉴于武汉政府的地位日渐下降，列强应暂时观望时局，等待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巩固基础”即打倒武汉政府后与之交涉。^⑥蒂雷则表示英国政府尚未决定放弃与陈友仁谈判，鉴于正在讨论的第二次通牒是以陈友仁为对象，且已与之展开书面往复，则陈友仁对此拥有更大责任。田中则进一步坚持以影响力有限的武汉政府交涉反将迁延不决，不如与南京政府谈判更为有利，并强调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判明蒋介石究竟有多大的诚意与实力。^⑦

5月3日，蒋介石电催伍朝枢赴宁就职外交部长。^⑧6日，伍朝枢为准备就任而访问驻沪日

① 《附支那問題報告》（1927年5月18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A03033694100。

② 杨天石、牛大勇等：《中华民国史》第2编第5卷，第312页。

③ 芳沢謙吉より田中義一宛第461号電：《武漢政府に対する第二次通牒案を至急承認方について》（1927年4月21日），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1927年），第601頁。

④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Minister in China (MacMurray),” April 20, 1927,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27, vol. 2, Washington: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2, pp. 203-204.

⑤ 駐米大使松平より田中義一宛第149号電：《南京事件解決交渉は列国協調の必要を認むるも第二次通牒発出には反対の旨米國務長官の意向表明について》（1927年5月3日），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1927年），第622頁。

⑥ 《大臣会見録二：五月三日午後三時英国大使田中大臣ヲ来訪》（1927年5月3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2030006100。

⑦ 田中義一より芳沢謙吉、駐英大使松井慶四郎合第145号電：《武漢政府に対する第二次通牒問題等に関する英国大使との会談について》（1927年5月5日），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1927年），第627—628頁。

⑧ 《蒋中正电张人杰请代催伍朝枢速来宁就职》，“蒋中正总统文物”，台北“国史馆”藏，002—010100—00008—01。

领矢田七太郎，表示南京政府愿与列强就宁案展开谈判。^① 7日，芳泽谦吉向田中义一建议应与南京政府展开单独交涉，以期迅速解决问题。田中则电令芳泽应坚持五国协调体制，认为南京政府尚处草创阶段，需等待其巩固基础，确认其有解决问题的诚意与能力，届时美英等国亦当改变反对态度。^② 9日，英国外交大臣在下院的讲演中表示不再向陈友仁提交第二次通牒，放弃与武汉政府的交涉，而期待与摒弃“排外运动”的“稳健”政权展开谈判。^③ 13日，蒂雷访问田中义一，表示英国决定撤离驻武汉代表，^④ 同时询问田中对南京政府的意见。田中分析陈友仁之所以召集各国代表到汉口，旨在挽回武汉政府日益下降的权威与影响，评价蒋介石已在认真“剿共”，并积极思考与外国建立关系。^⑤ 29日，伍朝枢向矢田七太郎提交了南京政府声明解决宁案的计划。田中认为既然南京政府主动承担责任，并为此发布声明，则可避免引起武力制裁问题，故正式训令芳泽谦吉诱导列强驻华公使与南京政府展开谈判。^⑥ 6月2日，列强公使在北京围绕南京政府的声明案召开了会议，就声明各条进行审议。^⑦ 此后，日本与其他列强均以南京政府为对象展开谈判，并于1929年前后相继达成一致。这实际上是对南京政府合法地位的间接肯定，从而否定了武汉政府的合法性。

日本在放弃武汉政府为交涉对象的同时，还拒绝武汉政府与之“通好”的各项要求。南京事件爆发后，武汉政府鉴于日本作为中国的邻国，有出兵迅疾之地理优势，故担忧英美列强联合日本采取武力干涉政策。4月1日，宋子文致电陈友仁，认为英日联合干涉上海革命局势的危险性很大。武汉政府继续坚持出师北伐以来采取的“拉拢日本、分化列强”的对外政策。陈友仁判断只要不发生扰乱日租界事件，日本不至于与英联合，故而注意保护汉口日租界。鲍罗廷亦主张拉拢日本，促使“英、日分离”、“帝国主义者分化”，故而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提议向日本人民发出友好宣言。^⑧ 不料，4月3日，汉口日租界发生中国民众与日本水兵的冲突事件，武汉政府为拉拢日本，不仅未采取“一·三”英租界事件时趁势收回租界的做法，反而隔离双方，解散民众，将日本6名水兵与4名商人押送至武汉卫戍司令部，实为对之进行人身保护。4月5日，鲍罗廷在第九次中执委政委会上，针对汉口事件按照苏联联合

① 矢田七太郎より田中義一宛第715号電：《今後の南京事件処理方法に関し伍朝枢等と会談について》（1927年5月6日），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1927年），第628—629頁。

② 田中義一より芳沢謙吉宛第265号電：《南京事件解決交渉は五国協調によるべきで南京政府を相手とする単独交渉は慎重考量を要することについて》（1927年5月10日），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1927年），第631頁。

③ Kenneth Bourne and D. Cameron Watt, eds., *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Affairs*, series E, vol. 20, p. 35; 駐英大使より田中義一宛第134号電：《英国外相下院にて武漢政府への第二次通牒発出取止めの事情説明について》（1927年5月11日），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1927年），第632頁。

④ 《附支那問題報告》（1927年5月18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A03033694100。

⑤ 《大臣会見録六：五月十三日午後英国大使来訪》（1927年5月13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2030006200。

⑥ 田中義一より芳沢謙吉宛第306号電：《南京政府声明案に関し四国代表者を誘導して解決の気運醸成方について》（1927年6月1日），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1927年），第635頁。

⑦ 芳沢謙吉より田中義一宛第616号電：《南京政府声明案に関する五国公使会議審議状況について》（1927年6月2日），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1927年），第637頁。

⑧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4月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005、1007—1008页。

德、中、日对抗英美列强的对外战略，要求陈友仁在对日宣言中采取友好方针。^① 会议还决定专门成立由陈友仁、顾孟余、徐谦、孙科、邓演达五人组成的对日外交政策研究会研讨对日问题，并请鲍罗廷参加。^② 4月9日，陈友仁在武汉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紧急会议上出示了经对日外交政策研究会商讨草拟的对日友好宣言，其要有六：第一，日本从前虽亦推行侵略政策，但现有放弃此种政策的趋势；第二，同佐分利贞男谈话的结果，知道中日现有谅解之可能；第三，在中日未真正谅解之前，认日本为友邦；第四，由南京事件可以证明日本有为中国友邦之诚意；第五，虽有汉口日租界事件的发生，但国民政府并未改变态度；第六，将来如有事件发生，有随时解决之必要。^③

4月11日，武汉政府在接到列强第一次共同通牒以后，立即实施了拉拢日本、分化列强协调体制的政策。陈友仁于当日专程访问日领高尾亨，表示武汉政府区别对待日本与英美，对日采取“友善”方针，汪精卫也完全同意“友日”政策，^④ 希望日本能够单独与中国谈判解决南京事件。为此，陈友仁向高尾提交了《国民政府就南京事件对日方针的声明》。文件充分肯定日本并未参加英美炮击南京是对中国的“友好行为”，表示中国政府向日本朝野声明“中国追求民族国家的实践绝不会威胁日本的正当利益与幸福”。同时为了避免不幸事件的重演，需要立即着手根本解决日本基于不平等条约而使中国在政治、经济上处于屈从地位，以及由此引发的一切问题。陈友仁希望日本政府为解决南京、汉口事件，修改不平等条约，派遣“代表”到武汉进行商谈，^⑤ 并表示两三日后将公布对日友好声明。高尾则借口日本国民在南京事件及汉口事件后群情激奋，且日本与列强的协调体制可能受到影响，要求陈友仁切勿公开声明，并告知日本政府应难以同意派遣代表到武汉。另一方面，高尾在向外务省的报告中，强调英国在向武汉政府采取强硬政策的同时，其驻汉口领事却极力讨好陈友仁，实际上采取了“软硬两手政策”。而汉口事件后武汉政府确实采取了不同于英租界事件时的“煽动”工运政策，而是严加控制民众运动，并判断随着汪精卫的到来，徐谦、邓演达等“亲共分子”将失势，武汉的“共产化运动”将逐渐得到改善。基于上述认识，高尾建议不能将武汉政府与“共产分子过激派”完全画等号，若一味敌视武汉政府，在南京事件上采取与英国完全一致的强逼政策，则势必促使武汉的共产党日益得势。^⑥ 然而，外务省指示高尾不能落入武汉政府“以夷制夷”的圈套，而应与列强保持协调，采取共同行动，要求中方切勿公开对日友好声明。^⑦ 在遭到高尾的拒绝后，陈友仁在第十一

①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4月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1023、1022页。

② 《为关于对日外交方针函知陈徐等五委员组织委员会研并请鲍顾问参加》（1927年4月10日），台北“国史馆”藏，汉14842。

③ 杨天石、牛大勇等：《中华民国史》第2编第5卷，第465页。

④ 矢田七太郎より幣原喜重郎宛第563号電：《南京事件に関する国民政府の対日方針および英国の中国政策について高尾総領事の意見具申》（1927年4月13日），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1927年），第585頁。

⑤ 矢田七太郎より幣原喜重郎宛第565号電（1927年4月13日），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1927年），第586頁。

⑥ 矢田七太郎より幣原喜重郎宛第563号電：《南京事件に関する国民政府の対日方針および英国の中国政策について高尾総領事の意見具申》（1927年4月13日），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1927年），第585頁。

⑦ 幣原喜重郎より矢田七太郎宛第178号電：《南京事件交渉は列国との協調を基本とするため武漢政府の対日方針発表見合わせ方高尾総領事へ転電について》（1927年4月16日），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1927年），第597—599頁。

次中执委政委会上建议暂缓发表对日宣言,得到大会认可。^①

4月13日,英国驻汉口领事电话恫吓陈友仁,要求翌日必须提交答复,否则列强另有通告。当日,陈友仁在第十二次国民党中央执委政委会上,表示外交问题已很严重,提出分别答复列强的方针,并单独宣读了拟定的对日答复全文,获得通过。^②4月14日,陈友仁召见高尾,试图向日本单独提交答复,遭到高尾的拒绝。^③武汉政府对对日表示善意,在对列强的共同通牒答复中唯对日本的措辞有所区别,表示作为友邦准备对日本驻南京领事馆所受损失进行赔偿,^④但未能达到分化列强的目的,日本驻华公使依然参与了五国公使团会议,与列强采取一致行动。^⑤为了缓和与日本等列强的关系,扭转经济与财政困境,在第十二次国民党中央执委政委会上,孙科、陈友仁、谭延闿、汪精卫等人批判过火的工人运动导致国内外工厂关门歇业,属于“自杀”行为,决定由中央工人部、国民政府劳工部、外交部三部长组织专门的委员会处理劳工与外交有关问题。^⑥4月15日,三部长联合召开第一次国民政府外交劳资委员会会议,决定抑制涉外的罢工运动。^⑦至此,武汉政府在工人运动上开始与日本等列强妥协。

当蒋介石决定起用伍朝枢为外交部长与列强解决宁案以后,陈友仁于5月4、5日连续两次访问汉口日领馆不得,高尾遂派代理往访陈友仁。陈向日方提出在田中义一上任之际,国民政府拟就对日政策尤其是国民政府占领北京与东北问题,与日本进行推心置腹的非正式交流,以避免误解,故希望日本派遣负责代表对武汉进行非正式访问。5月9日,田中义一接到驻粤日领从李宗仁处探得的武汉政府的近况,内称:武汉政府由于国民党的“清党运动”完全陷于孤立,且与最大的后台苏联之间的联络亦被阻断。武汉政府为求财源与对苏联联络港口,势必反攻广东。李宗仁已派钱大钧率部驻守广东省境以防止武汉派的反攻。^⑧基于上述情况,田中于当日训令高尾称:此际陈友仁提出派代表访问武汉的要求是为摆脱窘境,诸如汉口事件等地方性问题姑且不论,列强之间就南京事件正在考虑今后是否继续与武汉政府交涉。故日方无需与“此种政府”交涉“满蒙”等政治问题,对陈友仁以时机未至轻以敷衍即可。关于派遣代表一事,田中以日本的官制与欧美不同,并不明确区分外交官与领事官,并已形成领事官具有代表权在华进行外交谈判的习惯,且日本政府在汉口等事关重大之地配有高官担任总领事,故现有体制足以与中方进行交流,即便是非正式会谈,亦无需特派代表。高尾于5月13日向陈友仁表达了田中的上述意见,正式拒绝了武汉政府与日本通好的要求。^⑨无独有偶,南京政府竟于同日公开宣布免除

①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4月1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1044—1045页。

②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4月1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1054、1058—1059页。

③ 芳沢謙吉より幣原喜重郎宛第428号電:《南京事件要求に対する武漢政府回答およびその経緯について高尾総領事の報告》(1927年4月15日),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1927年),第589—590頁。

④ 《外交部长陈友仁上中央政治会议呈》(1927年4月14日),台北“国史馆”藏,汉13825。

⑤ 芳沢謙吉より幣原喜重郎宛第428号電:《南京事件要求に対する武漢政府回答およびその経緯について高尾総領事の報告》(1927年4月15日),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1927年),第590頁。

⑥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4月1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1054—1056页。

⑦ 《国民政府外交劳资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1927年4月15日),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武汉国民政府史料》,武汉:武汉出版社,2005年,第12—13页。

⑧ 森田寛蔵より田中義一宛第120号電(1927年5月9日),《支那内乱關係一件:国民軍ノ北伐關係》(1),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2031857900。

⑨ 《最近支那關係諸問題摘要》(2),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13081131500,第239—240頁。

陈友仁的代理外交总长职务。^①

可见，在“宁案交涉”问题上，武汉政府极其重视日本的态度，并在苏联的影响下实施了“拉拢日本”、“分化列强”的诸多措施，但田中内阁针锋相对地试图引导列强恢复对华协调体制，并影响英国等列强实施了“弃汉扶宁”的“扶蒋反共”政策。这无疑加剧了武汉国民政府的内外交困局面，间接地构成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的一大外因，进而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

三、“南北妥协”政策与宁、奉反应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与武汉政府分头北伐，前者沿津浦线与孙传芳、张宗昌对阵，后者沿京汉线与吴佩孚、张作霖对阵。同时宁汉又相互戒备。如何在南京、武汉、北京三个政权之间纵横捭阖，贯彻“反共”方针，维护、扩大日本在华权益，成为田中内阁的当务之急。

“分治中国”是民国初年日本已在暗中推行的侵华方针。日本认为袁世凯是唯一有能力统一中国的实力派，但在迫签“二十一条”时，遭到袁的顽强抵制。当袁世凯称帝时，以时任参谋次长田中义一为代表的日本军部与内阁，就促使中国陷入四分五裂，从而强化其对华控制达成了一致。^② 在此策略下，日本朝野掀起“倒袁运动”，破坏中国的统一。袁世凯去世后，中国陷入军阀混战局面。寺内正毅内阁通过援助段祺瑞攫取中国利权，客观上打压孙中山组建的广东军政府。一战后，日本鉴于英美的压力对华标榜“不干涉政策”，但原敬首相基于中国的分裂有利于日本“趁隙获取利益”的认识，实际上依然采取援助北洋政府的政策。^③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后，日本鉴于苏联对华影响力加大，开始转变“不干涉政策”，通过援助张作霖维护、扩大其在中国权益。1926年底，国民革命军势如破竹地攻占长江流域，日本在倚重张作霖与国民革命军对抗的同时，寻机瓦解国民革命阵营，破坏国共合作，怂恿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日本故伎重演，推行所谓的“南北妥协”政策，介入张、蒋之间，多番斡旋。日本军方早在南京事件爆发不久便确定了促使中国南北“稳健派”政权合作以共同“讨共”的政策。^④ 1927年4月末，蒋介石的代表蒋方震与张作霖的代表张厚琬为祝贺田中义一内阁上台先后抵达日本。长期担任北洋军阀之军事顾问的坂西利八郎与时任张作霖军事顾问的松井七夫从中斡旋，企图促使蒋、张和解，共同对抗武汉政府。^⑤ 田中义一首相也亲自上阵，让双方代表分别向张、蒋转达了希望二者妥协合作并加强取缔共产党的意见。^⑥ 在日本的介入下，蒋、张代表在东京达成一致，承诺在某种条件下实现停战、共同采取弹压共产党的政策，即双

① 《陈友仁免职》，《顺天时报》1927年5月15日，第2版。南京政府实际于4月19日已照准胡汉民辞去外交部长，免除陈友仁代理外交部长之职，任命伍朝枢为外交部长。详见《外交部长胡汉民辞职照准案》，《特命伍朝枢为外交部长》（1927年4月19日），台北国民党党史馆藏，1—81—1、1—81—3。

② 北岡伸一：《日本陸軍と大陸政策》，第192頁。

③ 原奎一郎编：《原敬日記》（7），東京：乾元社，1951年，第241頁；原奎一郎编：《原敬日記》（8），東京：乾元社，1950年，第249頁。

④ 《南京事件に関する五国政府の国民政府に対する抗議について》（1927年4月11日），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1927年），第577—580頁。

⑤ 《支那政況概観》（1927年6月25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2031820600。

⑥ 《田中義一より芳沢謙吉宛電》（1927年5月20日），《東方會議關係一件（松本記録）》，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2030506600。

方在纯粹的国民主义旗帜下在南北各自的范围内“肃清”共产党，并在召集政治会议后再召开国民会议。但两派就势力范围争执不下，蒋方主张以郑州、徐州线即陇海线划界，奉方则要求以长江划界，双方决定就此以后再谈。^①而后，双方代表各自回国汇报、请示。

当时奉系对于南北议和存在两种不同意见。总参谋长杨宇霆认为既然蒋介石已经采取“反共”政策，就应与之妥协。^②但张作霖怀疑蒋介石的“反共绝俄”决心，担忧南北议和只不过是蒋为摆脱困境的计策，^③主张应在南方陷入内讧之际对宁汉均施以武力打击，^④计划先在河南发动攻势击溃武汉政府的唐生智军以后，再将部队转到山东进攻蒋介石。^⑤蒋介石确有与奉张缓和关系的需要。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一面抵御江北的直鲁联军，一面调遣军队分赴长江上流围攻朱培德、鲁涤平等部，^⑥并于5月1日电催朱绍良准备攻击武汉的输送计划。^⑦面临东西线同时作战局面的蒋介石，极其担忧张作霖抽调京汉线军队进攻宁沪，故希望与奉军缓和关系。

蒋介石曾派郭同到天津谋和，5月9日，郭同无功而返。^⑧蒋又派代表赴大连与杨宇霆协商。^⑨杨宇霆为此返奉，并鉴于张作霖的反对态度，于5月10日向奉天日领吉田茂委婉地表示：若田中义一从中调和，奉系愿与蒋妥协。^⑩为了避免列强的批判，日本策划通过阎锡山调和奉宁关系。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本庄繁利用晋阎夹于奉张与秦冯、鄂唐、宁蒋之间，其地盘亦处险境的状况，于5月10日面晤阎锡山心腹潘连茹，向其通告奉宁妥协正在进行，希望阎锡山从中斡旋，以促使南北实现妥协。日本亦有学者注意到此事，但评价其为旨在促进中国“和平统一”的“分治合作主义”。^⑪然而，查本庄繁之提案，称奉方唯有两个条件，一为“铲除共党”，二为“与俄脱离关系”，如宁方能实行上述条件，则津浦战事立停。妥协步骤是先停战，以长江为界，成立南北两政府，然后徐图统一。^⑫由此观之，本庄繁劝告“南北妥协”，目的在于“反共逐俄”，以长江为界“分治中国”，所谓“徐图统一”仅是装饰门面的外交辞令而已。11日，阎锡山采纳日本建议，致电蒋介石劝其“联奉讨共”，并称张作霖已电令张宗昌、孙传芳不再进攻蒋

① 《最近支那關係諸問題摘要》(2)，Ref. B13081131500，第225—226頁；《松井少将支那時局二関スル講演要領》(1927年6月13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2031811900。

② 吉田茂より田中義一宛機密第272号書簡：《楊宇霆ノ時局談二関スル件》(1927年5月10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2031858000。

③ 《南北议和未开始》，《顺天时报》1927年5月3日，第2版。

④ 芳沢謙吉より田中義一宛機密第448号書簡：《葉恭綽ノ時局談報告ノ件》(1927年5月4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2031857900。

⑤ 《松井少将支那時局二関スル講演要領》(1927年6月13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2031811900。

⑥ 《蒋介石军两面受敌》，《顺天时报》1927年5月2日，第2版。

⑦ 《蒋中正电催朱绍良速着手进行讨伐武汉输送计划》，“蒋中正总统文物”，台北“国史馆”藏，002—010100—00008—001。

⑧ 《到津运动南北议和之郭同扫兴南旋》，季啸风、沈友益编：《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第24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82、179页。

⑨ 《李芬園促奉宁合作电》(1927年5月10日)，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阎伯川先生要电录》，台北：七海印刷有限公司，1996年，第249页。

⑩ 吉田茂より田中義一宛機密第272号書簡：《楊宇霆ノ時局談二関スル件》(1927年5月10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2031858000。

⑪ 樋口秀実：《日本陸軍の中国認識の変遷と分治合作主義》，《アジア経済》2016年第1号。

⑫ 伊藤隆ほか編：《本庄繁日記》，東京：山川出版社，1982年，第165頁；《潘连茹奉宁进行合作电》(1927年5月10日)，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阎伯川先生要电录》，第250页。

介石。^①同时，阎锡山电令李芬圃向张作霖转达如下劝告：揭举三民主义大旗团结各方，“共同讨赤”，以便蒋介石答应与之妥协。^②

然而，经过5月上旬的一系列激战，蒋介石初步扭转了相对于直鲁联军的不利局势。5月12日，蒋介石下令兵分三路进击直鲁联军。13日，蒋介石接到阎之来电，判断“奉欲求和”。^③同日，蒋下令渡江进击鲁军。^④此时，留京奉系仍存“攻宁”、“攻汉”两种主张，有人认为若“志为讨赤应直捣武汉”，有人则主张“为军事价值则应先取沪宁”。^⑤14日，田中义一在外务省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希望蒋介石与北方军阀妥协，“挥师武汉打倒共产党”。^⑥15日，蒋介石为解除武汉的后顾之忧，要求广州的李济琛调兵压迫武汉，同时电令黔、川主将李燊、杨森等部队向岳州、长沙急进，进攻武汉政府。^⑦同日，张宗昌从浦口退兵。张作霖调遣正在豫南与武汉政府对峙的韩麟春部赴皖助战鲁张。^⑧蒋介石怀疑张学良与汪精卫亦有“勾结”，并鉴于唐生智入豫有旬却无战报，怀疑“奉唐已妥协”，推断奉军有“从陇海路移向津浦与鲁军全力对我之计”。^⑨17日，阎锡山的代表拜访蒋介石，称如奉军东移攻宁，阎锡山将以实力攻奉。蒋遂决心“缓和奉军，先灭共产”，歼除直鲁联军，拉拢西北之冯玉祥。^⑩18日，田中在枢密院的报告中批判了否定南北妥协的张作霖，称“北方在扫荡共产党问题上与蒋介石持相同立场，本应援蒋，却采取了相反的行动，进攻蒋介石”。田中肯定了杨宇霆的态度，认为可凭借杨宇霆等新派人物“或可实现南北妥协”。^⑪5月20日，田中训令驻华公使与驻沪日领称：“蒋介石正在认真剿灭共产党，逐步致力于维持秩序，若能照此发展，我国应给予精神援助，以助其实现政治意图。故当蒋介石向武汉用兵之时，应极力避免北方从侧翼妨碍蒋介石，同时应当促成南北妥协的实现。”^⑫当晚，奉系在张作霖居住的顺承王府召开会议，围绕对蒋妥协问题发生分歧，在杨宇霆、吴俊升、张景惠等人的建议下，张作霖放弃到前线巡察督战。^⑬5月21日，奉军迂回驻马店之骑兵为唐生智部所败，奉焰遭挫，韩麟春与张学良又鉴于冯玉祥兵出潼关，遂致电蒋介石求和。^⑭此时，蒋在攻占浦口后渡江攻陷滁州，扭转了战局，杨森、李燊亦逼近武汉，^⑮且蒋已得到武汉方面“不打到北京，不谈政治”的保证，^⑯故对奉系的求和置之不理。

① 《致蒋总司令与奉方联合电》（1927年5月11日），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阎伯川先生要电录》，第250页。

② 《复李芬圃奉蒋合作电》（1927年5月11日），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阎伯川先生要电录》，第251页。

③ 《蒋介石日记》，1927年5月13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

④ 《南北将大决战》，《顺天时报》1927年5月16日，第2版。

⑤ 《奉系对南分攻宁攻汉两主张》，《顺天时报》1927年5月14日，第2版。

⑥ 高倉徹一編：《田中義一伝記》（下），第620頁。

⑦ 《蒋中正电李济琛汉口当局有退粤意令李燊杨森等部队向岳州长沙急进》，“蒋中正总统文物”，台北“国史馆”藏，002—010100—00008—049。

⑧ 《韩麟春部赴皖助战》，《顺天时报》1927年5月16日，第2版。

⑨ 《蒋介石日记》，1927年5月14日。

⑩ 《蒋介石日记》，1927年5月17日。

⑪ 《附支那問題報告》（1927年5月18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A03033694100。

⑫ 《最近支那關係諸問題摘要》（2），Ref. B13081131500，第249—250頁。

⑬ 《为对蒋妥协奉派内部发生问题，张氏中止出巡此为主因》，《顺天时报》1927年5月21日，第2版。

⑭ 《蒋介石日记》，1927年5月21日。

⑮ 《蒋中正电孔祥熙指杨森李燊等各部已逼近武汉结果未料请宋庆龄速回》，“蒋中正总统文物”，台北“国史馆”藏，002—010100—00008—069。

⑯ 杨天石、牛大勇等：《中华民国史》第2编第5卷，第567—568页。

奉系战事陷入不利境地后,日本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松井石根亲自到南京、武汉进行游说。蒋介石于5月22日攻克蚌埠,^①接近日本传统的势力范围山东。5月24日,松井石根及外务省官员在南京访问蒋介石,蒋认为二人此行关系到日本对华方针,极其重视,特推迟奔赴前线的行程。^②蒋与松井商谈两小时,却感到松井“态度可嫌”。次日,蒋往访松井,感到“烦闷已极”。^③从现有资料虽无法查证二人会谈的内容,但从参谋本部的对华方针可窥测松井访华的目的。军部是日本推行“反共”政策的急先锋,早在1926年末便派遣高级特务铃木贞一拉拢蒋介石,企图促蒋“反共逐俄”。^④南京事件后,松井向若槻内阁提出了改变不干涉政策的建议,要求拉拢蒋介石等“稳健派”以“铲除共产派”,并推动南北“稳健派”达成“妥协”。^⑤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参谋本部仍怀疑蒋介石雇用加仑等苏联顾问,并未彻底断绝与苏联的关系。^⑥由此可以推测,松井石根应向蒋介石提出了驱逐苏联顾问,彻底断绝与苏联的关系,并停止北进,与张作霖合作,进攻武汉政府等要求。其中停止北进的劝告自然令蒋介石不快,但蒋隐忍向日本表示打算在占领徐州后转攻武汉。^⑦日本并不完全信任蒋介石,田中内阁为阻遏蒋进攻山东,于5月27日出台了第一次出兵山东政策。同日,松井石根又携矶谷廉介、佐佐木到一等人专程到武汉说服谭延闿,要求立即“断绝与共产党的关系,回归原来的国民党”。^⑧松井还劝诱谭延闿与之偕行,调和宁汉之右派合作,共同“反共逐俄”,谭延闿对此未置可否,但在日记中推测“日人已有成算,则无疑也”。^⑨其后谭延闿确实走上了与南京政府合作的道路,成为其主席。

5月28日,冯玉祥策应武汉政府,兵出洛阳讨奉,蒋介石推测若占徐州,奉军必定放弃郑州退守河北,“是与共产党以大利,须研究处置。先放宽奉方一步,俾其专心对共乎”。^⑩29日,蒋介石决心主力兜剿东线的孙传芳,而对徐州缓进。同日,奉军在唐冯联军的合击之下决定收缩战线,全军渡黄河北撤,于31日撤毕。^⑪6月2日,蒋介石得知奉军已退出郑州,唐生智占领许昌,才电令主力速占徐州。^⑫3日,冯玉祥占领郑州,蒋介石占领徐州,北伐战局推进到陇海线上。

6月4日,蒋介石开会商讨时局,决定敦促冯玉祥断绝与武汉政府之关系,并进攻武汉,在此基础上,建立蒋、冯、阎联盟,进取北京。^⑬6日,阎锡山经过观望,决定接受南京政府的任命,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易帜拥蒋。14日,蒋又认为根据冯玉祥之“联蒋”抑或“联共”的态度可采之策有二。其一,若冯“联蒋反共”,进攻并坐镇武汉,则蒋选与冯、阎

① 《蒋介石日记》,1927年5月22日。

② 《蒋中正电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指日本松井石根及外交省局长来宁待约谈后再至前方与诸位相叙》,“蒋中正总统文物”,台北“国史馆”藏,002—010100—00008—074。

③ 《蒋介石日记》,1927年5月24、25日。

④ 参见王美平:《日本政府对一次北伐的观察与反应》,《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9年第2期。

⑤ 参谋本部第二部:《南京事件等に鑑み蒋介石総司令および武漢政府に対する方針について》(1927年3月28日),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1927年),第519—520頁。

⑥ 《松井少将支那時局二閣スル講演要領》(1927年6月13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2031811900。

⑦ 《北伐の最終地点は徐州と蒋介石言明について》(1927年5月25日),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1927年),第926頁。

⑧ 佐々木到一:《ある軍人の自伝》,東京:普通社,1963年,第151—152頁。

⑨ 《谭延闿日记》,1927年5月27日,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档案馆藏。

⑩ 《蒋介石日记》,1927年5月28日。

⑪ 《支那時局報告》(1927年6月1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A03033694700。

⑫ 《蒋介石日记》,1927年6月2日。

⑬ 《蒋介石日记》,1927年6月4日。

合作，促阎“出兵京津”，蒋攻济南。其二，若冯“联共反蒋”，则选与阎、张合作，促阎、张分出洛阳、郑州，蒋攻武汉。若冯不联共，阎不入京，则蒋以小股部队攻取胶济路。不得则以若干部队防守临城、沂州一线，以主力集结于临城、徐州、蚌埠、临淮、浦口一带，静观变化，以消灭孙传芳为最低目标。^①此后，蒋介石按照上述战略推行其相关政策，冯玉祥的态度成为左右蒋介石战略取向的关键因素。15日，蒋闻唐生智、张发奎由豫回汉，判断唐“以豫交冯，而以全力巩固两湖后，或南下攻粤或东下攻宁”。^②冯玉祥态度的重要性更为凸显。19日，蒋、冯进行徐州会谈，蒋许冯以每月200万元军费，冯答应以其个人名义劝武汉取消政府，并与蒋联名通电北伐。^③北洋军阀方面由于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等人怀疑蒋介石进攻武汉的诚意，且认为在北军不利之际进行妥协，实际等于投降，故决定暂不考虑议和问题，先着手内部整顿，以进行战、和两手准备。故张作霖于6月18日在张、孙等人的怂恿下就任陆海军大元帅，组建奉系内阁。有鉴于此，蒋介石也拒绝派遣代表北上交涉。^④日本策划的“张、蒋合作讨共”计划以失败告终。

此后，日本又要求张作霖退守关外，策动坚决“反共”的阎锡山出掌京津。其实，反对张作霖出关参与关内事务，避免东北与关内的一体化进程，通过割据东北的张作霖维护、扩大日本的所谓“满蒙特殊权益”，是日本向来的主张。1920年，张作霖与直系军阀结成联盟，发动直皖战争，表现出参与、掌控关内事务的欲望。1921年，奉系与直系因分赃不均产生矛盾，张作霖要求日本提供武器，准备发动对直战争。5月17日，日本内阁作出决议：“对张作霖整顿、充实东三省的內政与军备，以巩固其在该地的地位，日本帝国应当给予直接、间接的援助。但对于其进入中央政界的野心，则不能提供援助。”一旦张作霖介入关内，离开东北，日本将另择与张地位齐平者进行援助，与之“共享”东北利益。^⑤故而，在1922年的直奉战争中，日本并未援助张作霖。在1924年的直奉战争中，张作霖在日本的暗中援助下获胜，但仍不敢出关主政。1925年，在帮助张作霖镇压郭松龄倒戈事件后，日本政府几次劝张实施所谓的“保境安民”政策。1926年4月初，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奉外务省之令劝张切勿卷入关内战事，但张作霖仍出关与冯玉祥的国民军展开决战。4月中旬，日本驻北京公使馆武官要求张作霖在京津战事结束后，一定全部退回关外，切勿参与中央政局，并要求日本陆军中央以更有权威的命令迫使张作霖就范。^⑥8月，张作霖攻陷张家口，将国民军驱逐至西北，日本陆军次官畑英太郎又通过松井七夫向张作霖表达了如下意见：若继续作战，一则根本无法全歼国民军，二则东三省的财政、经济将不堪重负，恐将引发张作霖下台的严重事态。有鉴于此，东三省应见好就收，实行“保境安民”政策，尽早与冯玉祥妥协停战。^⑦币原外相亦通过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配合陆军要求张作霖

① 《蒋介石日记》，1927年6月14日。

② 《蒋介石日记》，1927年6月15日。

③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第2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36—337页；《蒋介石日记》，1927年6月19日。

④ 《支那政況概観》（1927年6月25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2031820600。

⑤ 《張作霖二対スル我態度二関スル件》（1921年5月17日），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1921年），東京：外務省，1977年，第302頁。

⑥ 《北京公使館附武官ヨリ陸軍大臣ヘ支第299号秘電》（1926年4月16日），郭洪茂、李力编：《近现代日本涉华密档·陆军省卷》第65册，北京：线装书局，2012年，第281—282页。

⑦ 陸第267号電：《次官ヨリ在奉天松井少将ヘ電報案》（1926年8月21日），郭洪茂、李力编：《近现代日本涉华密档·陆军省卷》第65册，第42—43页。

退守关外、“保境安民”。^①此后，张作霖虽未进击冯玉祥，但亦未退守关外，而是借助国民革命的“东风”，于12月1日在天津宣誓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实际掌控北京政府。此时，日本也迫于“反共”的形势，对张作霖有所让步，促其帮助连丢长江要地的孙传芳。^②1927年3月，铃木贞一奉命到九江劝蒋“反共逐俄”时，蒋向其提议日本劝说张作霖退回东北。^③铃木回国后向田中义一报告了蒋的这一要求。6月，随着北伐军进入山东，奉系军阀有如风中残烛，大有溃败之势。田中义一派遣山梨半造大将与铃木贞一到北京说服张作霖返回东北，^④但借助日本出兵转危为安的张作霖无意于不战而溃。

日本在策动张作霖退回东北的同时，怂恿阎锡山接手京津。5月25日，日本驻北京公使馆武官土肥原贤二通过晋阎驻京代表苏体仁向阎锡山表达了如下意见：“奉将退出关外，北方政局，自当由山西维持，斡旋南北，早息战争，以免再现宁汉等地之骚乱，而防杜赤俄之阴谋。”^⑤土肥原为达成目的，于29日与薄永济同行亲抵太原访问阎锡山。日本此举，实际上是企图避免长城以南出现统一局面，制造“反共”的张作霖、阎锡山、蒋介石分别统治东北、华北与长江流域的局面，以便其“分治中国”、从中渔利。该计划因张作霖拒绝退出关外而以失败告终，但为二次北伐期间形成阎、冯、蒋三分华北的局势奠定了基础。可见，在一次北伐期间，日本就并未打算让蒋介石攻占北京，统一华北。

由上，日本推行的“促蒋讨共”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蒋介石主要通过暗中策动西南军阀进攻武汉的方式实施了“讨共”政策。日本策划的“调和奉宁”政策，终因张、蒋的自主性而归失败。奉系内部虽有赞同“南北妥协”者，但张作霖起初由于战事顺利、贪图宁沪富庶之地而未采纳，最后随着战局陷入被动而将南北妥协视为“投降”，故而拒绝。张作霖在中央政局中表现出的这种“不易操控性”，及其在东北利权上的对日“抵制性”，促使企图吞并东北的关东军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日奉合作随之终结。蒋介石对于日本推动的“南北妥协”政策起初加以利用，而后随着战局的扭转，虽曾与日本约定北伐暂止徐州，但随着张作霖在北京就任陆海军大元帅，蒋亦拒绝和谈，同时结成蒋冯阎联盟，通电继续北伐。根本而言，田中内阁推行的“南北妥协”政策，是为阻挠国民革命军推进统一事业，实现以长江为界“分治中国”的目的，其实质是企图继续维护、扩大日本在东北、华北乃至长江流域的权益。这一企图与中国大一统的历史传统、国民信仰和天下大势背道而驰，注定走向失败。

四、日本“分治中国”战略的出炉与蒋日合作的终结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田中内阁利用中国时局相对和缓的机会，在强硬派外务政务次官森恪的极力推动与主持下召集驻华公使及领事、关东军长官等相关人员，召开东方会议，商讨应对北伐局势的政策。学界关于东方会议的研究，主要侧重其“分离满蒙”的武力侵华面

① 軍事課：《奉天側ノ指導二関スル件》（1926年8月21日），郭洪茂、李力编：《近现代日本涉华密档·陆军省卷》第65册，第45—49页。

② 角田順校：《宇垣一成日記》（1），第555頁。

③ 木戸日記研究会、日本近代史料研究会編：《鈴木貞一氏談話速記録》（下），東京：日本近代史料研究会，1974年，第274—275頁。

④ 木戸日記研究会、日本近代史料研究会編：《鈴木貞一氏談話速記録》（下），第293頁。

⑤ 《苏体仁等日本望晋维持北方斡旋南北电》（1927年5月25日），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阎伯川先生要电录》，第252页。

相，而忽略了其“扶蒋反共”的分化侵华面相。

如何对待中国出现张作霖军阀政权、武汉政府与南京政府三足鼎立的局面，成为东方会议讨论的重要议题。驻沪日领矢田七太郎与驻汉口日领高尾亨主张援助国民党右派政府。矢田认为对华采取压迫政策是行不通的，对共产党实施武力压制政策也是极其危险的，既然国民革命是以民众为中心的运动，就不能使用武力，但也不能采取放任主义。当南方的分化朝着有利于日本的方向发展时，放任主义是有效的，若其分化朝着不利于日本的方向发展时，就必须采取对策。但是，过去的援助政策，不论是日本援助段祺瑞，还是英国援助吴佩孚，都归失败。苏联援助南方派，也正濒临惨败。援助政策之所以失败，是由以下原因决定的。其一，一国的单独援助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嫉妒与妨碍；其二，以个人为对象的援助没有民众基础，难以持久；其三，现今民众的力量极其伟大，提供武器、资金等物质援助已经落伍。矢田反对日本介于蒋、张之间促成二者妥协，主张采取援助南京政府的政策。他认为日本对华政策的目的是确保日本的贸易与投资在中国“能够得到公平公正的保护”，为此就需要将能够维护和平与秩序的政府作为交涉对象，这样的政府需要具备如下条件。首先，与日本在政治、经济、社会上具有大体相同的组织。其次，具有相当的持久性。由此观之，介于北方政权与武汉政权中间的南京政府是符合上述资格的。作为具体对策，矢田提出以下三点建议。首先，日本应将南京政府作为交涉对象，给其以援助，但并非在法理上承认之。其次，对于中国青年在租界、治外法权等问题上掀起的国民运动表达同情态度。最后，鉴于中国民众都认为日本在援助北方，日本应该去除此种疑念。矢田强调援助南京政府，并不以蒋介石个人为对象，而应以作为组织的南京政府乃至国民党为对象。高尾亨亦提出了类似主张。他认为现在武汉政府的对日态度是稳健的，日本应该利用此种形势，因势利导，以帮助当地日侨恢复经济。将来南方“稳健分子”即国民党右派若组建联合政权，日本就应承认之，并可以考虑进行援助。但他也强调以个人为对象进行的提携是拙劣的，应着眼于基于伟大民众力量之上的国民党组织加以援助。^①

矢田等人援助国民党右派的主张得到了采纳。东方会议出台的《对华政策纲领》共有八条规定，除后三条确定了武力“分离满蒙”与扶植张作霖的方针之外，其余五条主要针对的是中国“本土”部分。其中第二、三条均表达了对南京政府的支持之意。第二条规定：“对中国基于稳健分子觉醒之上的正当的国民要求，应给予满腔同情，期待其以合理渐进的方法推进，并与列国协同助其实现。”第三条规定：“上述目标的实现毕竟需以建立巩固的中央政府为前提，但由当前政局观之，难以形成此种政府，故当下应与各地的稳健派政权保持适当的接洽”。^②《对华政策纲领》是以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对东方会议进行总结、训示的形式颁布的，其目的在于指导、统一日本驻华各个外交与军事机构的对华政策与行动。在森恪就上述训示进行的解释中，明确指出第二项中的“稳健分子”是指国民党在主张上与共产党持相反立场，在经济与社会上都不会与日本的利益发生重大冲突，其追求目标的手段不太激进，日本应对国民党采取同情态度，助其实现理想，这有利于带来中国整体上的“和平”。第三项中“与各地的稳健派政权保持适当的接洽”，隐含了在必要时对国民党给予精神援助之意。森恪在就此进行说明时称：“物质援助”效果欠乏，“精神援助”更为有效。所谓“精神援助”，是指让各地的稳健派政权感到日本将引导列强承认其为正当政府，并可派遣外交官驻于当地。^③

① 《東方會議經過報告》，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1927年），第25—27頁。

② 田中義一より駐米大使代理堀宛第185号合電（1927年7月7日），《對支政策綱領二関スル訓令（松本記録）》，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2030037900。

③ 《東方會議經過報告》，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1927年），第36—37頁。

《对华政策纲领》在规定援助南京政府的同时,也明确规定了对共产党的反对与镇压方针。其第五条规定:“此间中国有不逞分子往往趁政局不稳而滋生事端,扰乱治安,引起不幸的国际事件。帝国政府对于此等不逞分子的镇压及秩序的维持都希望由中国政权的取缔以及国民的觉醒来实现,但当帝国在中国的权益及侨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有恐遭受不法侵害时,帝国政府需断然采取自卫措施加以保护。”^① 该项中的所谓“不逞分子”,即指共产党。森恪在关于田中训示的解释中明确指出该项是指“共产主义者煽动无知的游手好闲之徒及学生,特别是以排外运动为目标,采取破坏性的恐怖手段,扰乱秩序与社会组织”。^② 对于共产党领导的收回利权运动,田中训示明确采取武力镇压政策。东方会议由田中内阁联合军部召开,《对华政策纲领》是田中于7月6日上奏天皇获准后下达于会的,^③ 故“扶蒋反共”可谓成为日本国家的大政方针。

总之,东方会议确定了“扶蒋反共”的方针,这与“分离满蒙”方针共同构成日本政府“分治中国”战略的“一体两翼”。“分治中国”由民国初年日本政府的“默契”与“阴谋”升格为日本国家的对华“阳谋”与战略。面对中国北伐的敌对两方,日本采取同时援助双方的方针,其立案的前提就是无视中国的统一大势,一厢情愿地将中国分为“满蒙”与“本部”两个部分,又以长江将中国“本部”切分,而将“反共”的张作霖与阎锡山、蒋介石等国民党右派分别视为东北、华北、长江流域的主要对日合作者进行扶植,以追求对华扩张。这种“分治中国”的战略,无视了包括东北人民在内的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与追求统一的强大动力,终将失败。

东方会议结束后,田中内阁为表示对南京政府的支持,特派驻华公使芳泽谦吉作为首位到访的外国公使访问南京,在宁汉对峙的局面下,以示对南京政府的支持。芳泽于8月8、9日访问了南京,以蒋介石、胡汉民为首的南京政府给予了盛情款待。^④ 然而,田中内阁推行“扶蒋反共”政策,是以蒋介石不继续北上为前提的,其最终目的不在“扶蒋”,而在“反共”的同时以长江“分治中国”。故而,当蒋介石不顾日本劝告,率军渡江继续北上后,田中内阁实施了第一次出兵山东政策。当蒋介石按照既定战略策反胶济铁路之鲁军倒戈时,日本从青岛出兵济南,使得命垂一线的奉张势力转危为安,而国民革命军则气势不振。^⑤ 故蒋介石在外交委员会上宣讲日本“护奉军以排我党,其事显明”。^⑥ 蒋介石因日本的出兵干涉最终兵败江北,并在国民党的内部斗争中被迫于8月13日下野,继而又于9月28日乘船赴日访问。就北伐问题与日本交换意见,争取日本支持其北上为蒋介石此行的重要目的。在与田中义一会谈前夕,蒋介石便已总结出日本对华政策存在如下问题:“一、以为中国革命成功,其东亚地位动摇,尤其不能确保满蒙权利;二、中国南北分裂,可以从中操纵;三、利用无智军阀,压制民众”。^⑦ 蒋介石希望通过会谈扭转日本支持张作霖的政策。

宁汉合流后,田中内阁对武汉政府驱逐苏联顾问鲍罗廷、南京政府驱逐苏联军事顾问加仑进行了积极评价,但依然警戒共产党的存在与继续发展。广州起义失败后,蒋介石彻底断绝了

① 田中義一より駐米大使代理堀宛第185号合電(1927年7月7日),《対支政策綱領二関スル訓令(松本記録)》,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2030037900。

② 《東方會議經過報告》,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1927年),第37頁。

③ 《東方會議經過報告》,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1927年),第36頁。

④ 入江昭:《極東新秩序の模索》,第154頁。

⑤ 吉野作造:《吉野作造選集》(9),東京:岩波書店,1995年,第342頁。

⑥ 《蒋中正于外交委员会会议论日本之诡谋》(1927年6月25日),“蒋中正总统文物”,台北“国史馆”藏,002—060100—00003—055。

⑦ 《蒋介石日记》,1927年10月11日。

与苏联的外交与贸易关系。^① 即便如此，日本依然对共产党在中国的发展保持了高度警惕。松井石根公开发表评论称：“若因广州起义失败便判断中国共产党完全灭亡是极大的错误，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的交界成为其地盘，他们正在吞噬农村。其兵力虽不占优势，但与当地的土匪结合，不可轻视。在以上海为首的中南部城市中，共产党的活动并未停止，故根据取缔举措的轻重，他们随时都可能掀起暴动。”^② 因此，拉拢蒋介石在长江以南坚决“反共”，依然是日本对华政策的一大主题与目标。蒋介石访日期间先后两次与田中义一进行了会谈。10月13日，双方在森恪、张群的陪同下在箱根进行了会晤。时值晋奉战争爆发，张作霖在京绥线节节败退。^③ 在此背景下，蒋日之间就以下问题达成“密约”：“第一，日本认可蒋介石与共产党分裂并与苏联断绝关系以后推行的国民革命，希望其成功统一中国。第二，中国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地位与权益。”^④ 由此看来，在蒋介石与田中的首次会谈中，日本重点阐述了其对东北的态度与立场，希望蒋介石承认其所谓的“满蒙特殊权益”，并以此为前提同意蒋北上。11月5日，蒋介石携张群到田中的青山私邸进行了第二次访问，双方会谈两个小时。此时，张作霖已扭转对晋战争的不利，^⑤ 并在所谓“满蒙悬案”交涉中表现出对日方的妥协态度，签署了日本图谋已久的《满蒙新五路协约》，攫取了东北五铁道的铺设权。^⑥ 故而，日本调整了以蒋介石承认所谓的“满蒙特殊权益”为条件而支持其北伐的态度。在青山会谈中，田中将“箱根密约”所达成的一致改口为支持蒋介石巩固南方后继续北伐。田中反复劝说蒋介石应专注于南方的统一与巩固，以防止共产党的重新崛起。他认为宁汉虽然实现合流，但唐生智、汪精卫、李宗仁、白崇禧、程潜以及何应钦等人，都忙于争夺地盘，不顾大局，“如何统一他们”才是蒋介石最主要的课题。这是由于若不统一长江以南，则共产党“刚被摘除的嫩芽将再次生根萌发”。田中认为蒋介石具备稳定、控制南方局势的能力与实力，并表示日本对于蒋统一、巩固南方的工作“必定尽量援助”。他强调日本与中国利益攸关，对中国的内争可以不加干涉，“唯对共产党的跋扈断然不能旁观”。田中还进一步解释了其反对中国共产党的理由，即：“日本共产主义正在蔓延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日本之所以经常反对贵国的赤化，无外是出于此种自卫的考虑。我等同情蒋君也正是有基于此，若阁下是共产党的同情者，我等则不会信赖阁下。确信阁下的共产观与我等相同。”蒋介石虽对田中的“反共”言论表示赞同，但其谈话的重点则是希望田中支持其继续北上。田中虽表示不偏袒张作霖，但同时劝其切勿介入北方张、冯、阎之间的斗争，亦无需与冯、阎联络，^⑦ 实则是反对蒋北上。可见，二者的此次会谈，虽就“反共”达成了一致，但就日本是否支持蒋介石继续北上则存在严重分歧。

故而，当蒋介石于1928年春推行二次北伐时，田中内阁又两次出兵山东，制造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攻占济南，切断蒋介石的北上通道，使蒋丧失了实际控制华北的机会，蒋介石对日感情恶化至极，并将向日本雪耻定为竭力奋斗之事业。由此，日本推行的“扶蒋”

① 加藤聖文：《北伐と日中反共提携構想：田中義一・蒋介石会談をめぐる考察》，黄自進、劉建輝、戸部良一編：《〈日中戦争〉とは何だったのか》，第23頁。

② 高倉徹一編：《田中義一伝記》（下），第823頁。

③ 《支那政況概観》（1927年10月5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13080933400。

④ 山浦貫一編：《森恪》（下），第614頁。

⑤ 《最近支那關係諸問題摘要》（1）（1927年12月），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13081128700。

⑥ 芳沢謙吉より田中義一宛第1043号書簡（1927年10月19日），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1927年），第298頁。

⑦ 《田中総理・蒋介石会談録》，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2030164700；张群：《我与日本七十年》，台北：“中日关系研究会”，1980年，第27—28页。

政策终因其“分治中国”的战略而难以为继，但“反共”却依然是此后日本历届内阁推行侵华政策的重要方针。

结 语

综上所述，近代日本是列强在华推行“反共”政策的急先锋。田中义一基于对俄竞争关系，坚持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与“天皇制”国体的意识形态，以及维护东亚殖民统治等因素的考量，在上台伊始便针对国民革命打出了“反共”旗号。“反共”并不是田中内阁为拉拢蒋介石而采取的权宜之计，而是日本有着深远历史基础与战略意图的国家方针。

尽管武汉国民政府非常重视日本的地位，在苏联的影响下采取了一系列拉拢日本、分化列强的措施，但田中内阁依然推行了“弃汉扶宁”、“促蒋讨共”、“调和奉宁”、“南北妥协”等“扶蒋反共”政策。“弃汉扶宁”、“促蒋讨共”政策，加剧了武汉国民政府的内外交困局面，构成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的重要外因，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调和奉宁”与“南北妥协”政策，既是对田中内阁“反共”方针的贯彻，也证明日本政府并不真心让蒋介石统一华北，体现出日本以长江、长城分割中国的险恶用心。东方会议在出台“分离满蒙”方针的同时，确认了“扶蒋反共”方针，二者构成日本政府“分治中国”战略的“一体两翼”。“扶蒋反共”正是“分离满蒙”政策的重要环节与步骤，“分离满蒙”是“扶蒋反共”政策的重要目标。但是，田中内阁推行“扶蒋反共”政策，并不仅是为了“分离满蒙”，也是为巩固日本在华北、长江流域的权益，维护其在东亚范围内的殖民统治秩序。

蒋日虽因“反共”的共同目标进行了合作，但蒋介石控制华北的意图与日本“分治中国”的战略截然对立。故日本在长江以南采取“扶蒋反共”政策，一旦蒋介石越江北上，便推行“扶张反蒋”政策。日本“分治中国”的战略导致蒋介石此后不能实际控制华北，为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后分裂华北、全面侵华埋下伏笔。蒋日合作虽因双方矛盾的不可调和而走向破裂，但“反共”却成为日本对华政策的基调，并贯穿于14年侵华战争之始终。

〔作者王美平，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天津 300350〕

（责任编辑：刘 宇）

The Tanaka Cabinet' s Policy of Supporting Chiang Kai-Shek and Oppos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ang and Japan (1927-1928) Wang Meiping (97)

After the April 12 counter-revolutionary coup, Japan' s Tanaka Giichi Cabinet, bearing in mind Japan' s competition with the Soviet Union in China, its own anti-Communist ideology, and the maintenance of its colonial rule over East Asia, promoted policies targeting China' s national revolution. These included "abandoning Wuhan and supporting Nanjing," "a compromise between north and south" and "supporting Chiang in defeating the Communists." Japan thus became the spearhead of the imperialist powers' anti-Communist policy in East Asia and was an important external cause of the Wuhan national government' s rift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s. "Supporting Chiang in defeating the Communists," and "separating out Manchuria and Inner Mongolia" were two elements of Japan' s strategy against China that were launched at its Oriental Meeting. Japan' s actual intent was to bisect China along the Great Wall and the Yangtze River in order to protect its privileges in Northeast and North China and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Therefore, Japan and Chiang Kai-Shek cooperated under the aim of oppos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south of the Yangtze. However, when Chiang crossed the Yangtze and went north, Japan adopted a policy of supporting Chang Tso-Lin against Chiang, causing the final collapse of Japan' s cooperation with Chiang. Thereafter, "opposing the Communists" set the basic tone of Japan' s China policy throughout the fourteen years of its war of aggression.

The Shift in 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s Diplomatic Focus within a Framework of Multilateral Relations (1937-1940) Xiao Zili and Cai Zi (117)

In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full-scale Anti-Japanese War, influenced by the ideas of "world war" and "international resolution," 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had both wartime characteristics and prewar inertia in the diplomacy, focusing on forming alliances with Britain and the Soviet Union. From October 1938 on, conflict between the US and Japan in the Asia-Pacific intensified, and the US began to take a positive role in aiding China to resist Japan. However, being then under constant pressure from Europe, Britain kept compromising with Japan, leading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to start reordering the relative primacy of its relationship with Britain and the US. Wartime diplomacy presented a diversified situation in which Britai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S were of equal importance. During August and September 1939, Germany and the Soviet Union signed a non-aggression pact and war erupted in Europe. To join the British and French camp and at the same time find a joint solution to the Sino-Japanese War and the war in Europe,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at one time considered declaring war on Germany or recalling its ambassador. However, given that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was far from clear, it decided to align with Britain and France, but without making this public. The US factor was of vital importance in this course of action. It was not only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s standard for its policies on the European war but also its new diplomatic focus. After 1939, the U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ts aid to China, cooperating with and consolidating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s foreign policy of putting the United States first. Correspondingly, Britain and the Soviet Union fell back to the "second front" of the government' s foreign policy.